引　子

1940年，我们首先向法西斯发动了一场战役大反攻

1940年，是国际法西斯“力量全盛”的时期。

这一年，德国侵占了丹麦、挪威、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仅仅用6个星期的时间打败了世界强国法国，迫使法国政府于这年6月投降；接着又对英国首都伦敦及其它重要目标进行大轰炸，其中仅8月15日这一天，德军出动的飞机就多达1786架次。

日军也恢复了对中国的大进攻，侵占了距重庆仅648公里水路的战略要地宜昌，接着又对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及附近要地进行大轰炸，8月20日这一天，轰炸重庆的日机多达170多架，整个山城都被毁坏。

这时，美、苏两个大国还没参战。新组建的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流亡政府，到11月还只聚集了3万多人的武装力量。英国的处境很艰难。丘吉尔后来对斯大林说，1940年“当时希特勒正当力量全盛之时，而我们却只有2万多经过训练的军队，200门大炮和50辆坦克。”

中国一直在顽强地坚持抵抗，但人们一般都只指望中国不垮，而不敢指望中国能在反法西斯战斗中还有什么别的惊人之举。

就在这种低沉乃至使人感到绝望的局势下，中国的华北战场，已经被日军控制了3年的日占区，突然出现了一种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新局面。

1940年8月20日晚上，在总计长达5600余里的华北主要交通线上，神奇般地出现了数十万大军，其中主力兵团即达105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团。他们在敌人毫不知晓的情形下，于同一个小时内，向正在营房，堡垒酣然大睡的敌军，向防范严密的铁路、公路、桥梁、电线线路、厂矿等成百成千个军事目标发起了大举破袭。顿时，华北的夜空被数百万朵弹花照亮，日军的华北交通网，通讯网全面瘫痪。不可一世，扬言要在占领区建立“绝对权威”的“皇军”一下“陷入悲惨命运”,分散在各个小据点的日军更是呼救无门,待援不及“多数被共军全歼。”……

从这个晚上开始，华北日军的各重要目标持续不断地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在持续三四个月的战斗中，共有 44，488 名日伪军被击毙，打伤及俘虏，其中 20，926 人是日军。

这就是八路军在 1940年 8 月至 12月发动的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最令中国人民感到自豪的战役之一。就中国而言，此前的对日作战，总的来说，都属于应战性质。就如 1940年 9月 5 日《大公报》社论所说：“三年多的抗战军事，‘应战’二字，可以尽之。敌军来攻，我们应战；敌军不攻，我们待战，敌军此处攻，我们他处不战，形式几乎完全是被动的。”而百团大战则是由我军主动发起的，规模空前的进攻战。这是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壮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反法西斯阵营最先发起的一场战役大反攻。百团大战，无疑是中国“抗战史中最光荣的一页！”

从军事上说，进攻就必须在进攻方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才能打。就像古老的《孙子兵法》所说的那样“: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即必须有十倍于敌人的力量，才能围歼敌人，五倍于敌人的力量，才能发起进攻，等等。

很明显，在 1940 年，日军仍是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此前的战事不说,仅从 1941 年它在继续进行侵华战争的同时，又发起

太平洋战争，悍然向整个亚太地区，向美国开战这一点来说，敌强我弱的态势就相当清楚了。但我们不但打了个主动进攻的百团大战，而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就不能不令人大吃一惊。

更令人惊讶的是，百团大战并不是由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组织的，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支特殊的武装发动的。

众所周知，八路军在 1937 年 8 月编组时，全军只有十几个团。这十几个团中的约一半又分别在陕甘宁、山东和华中等地活动，没有参加百团大战。六七个团的“老八路”在敌人的后方坚持抗战 3 年，不但没有被强敌“扫荡”掉，反而向强敌发起了一场百团大战，这不是一个大奇迹，一个举世无双的大奇迹吗？

八路军是正式编入了中国军队序列的部队，但蒋介石政府每月只发给它 60 万元的军饷，仅够 4 万来人的起码生活费用，而且国民党政府经常因国共两党的矛盾而停发这笔相对稳定的款项。八路军创建了自己的根据地，但这些根据地大多是当地居民的温饱问题也难以解决的贫困山区。八路军在这种经济状况下能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这本身已是一个奇迹，能发动一场主动向敌人进攻，并坚持三四个月之久的百团大战，那就更是奇上加奇了。

国民党政府也不给八路军提供什么装备，抗战八年，八路军仅在 1939 年秋季以前从政府那里领过 120 挺机枪、6 门小炮和少量的子弹。此后就再也没领过一枪一弹。百团大战的对手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在现代战争中，“空枪抗战”是很危险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八路军竟用子弹不多的步枪和质量不太好的自制手榴弹打得日军惊慌失措，并成功地打了一些坚守阵地 6 天 6 夜的防御战和猛攻堡垒几天几夜的攻坚战，有些仗虽也打得很苦，但总的来说，全然没有出现那种弱手同强敌硬拼，虽很豪壮却又极为悲惨的局面。其中的奥妙，可说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百团大战不仅仅是令人感到自豪，而且能给人带来各种深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教益。

由于敌强我弱，抗战时期采取一些“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战术是许可的。对八路军这支无大后方做依托，无政府接济，无国际援助，生活最困苦，处境最险恶，装备最低劣，弹药最缺乏的军队来说，主要的抗战形式也是那种“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扑一下就跑”“打一枪换个地方”的灵活的、零星的游击战。但是，如果把这种游击战绝对化，并为了突出它而贬低乃至否定百团大战这样的打法，那就极端错误了。

第 一 章

过 黄 河

九曲黄河，在托克托处转了个近似 90°的大弯。滚滚东逝水成为滔滔南下河。

这段大河的西面是陕西，东面是山西。

从陕西到山西，就必须过黄河。从山西到陕西，也必须过黄河。

这种特征，引发过无数诡谲的历史风云。

现在，这种时刻又到了。

1. 蒋介石挽阎书堂：“吾公福命是神仙”

德昭颜训，勋业付儿曹，多士讴歌思元老；
数备箕畴，声名垂党国，吾公福命是神仙。

中正挽

阎书堂何许人也？能获此莫大的哀荣！

阎书堂者，阎锡山的父亲也。

阎锡山又有何能耐，能如此“光宗耀祖”？

阎锡山的能耐，就因为他是“山西王”。

对以长江流域为战略重心的蒋介石来说，山西本来不太重要，但当红军要把陕北作为中心根据地之后，山西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而要利用这块要地，就必须利用阎锡山这个“山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

1934 年 9 月，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开始从江西向陕西走来时，蒋介石坐着飞机，从南昌飞到了太原。

“老蒋来干什么？”

阎锡山颇为纳闷。

“南方战事告一段落，特抽暇前来西北看看。”

“请委员长多多赐教。”阎锡山道。

“百川兄治晋有方，《十年建设计划》规模宏大，中正十分佩服。”

阎锡山，字百川，一听蒋介石亲切的称呼，并对他大加赞誉，顿时有点受宠若惊。忙道：“谢谢委员长夸奖。”

“刘志丹在陕北闹得很凶，不知百川兄有何打算？”

“锡山一定加意防范。”

“必要时老兄可不可以助陕西一臂之力呀？”

“这……”

“有什么困难，说嘛！”

“山西物力不足，恐怕只能保境安民。”

“军械上和财政上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凡过河剿共的军队，武器和经费都由中央供应，就像这次百川兄派往江西剿共的李生达部一样。你看如何？”

“理当效劳，理当效劳”

公务谈完了。宴会上，蒋介石突然同阎锡山谈起家务来。

“听说老先生贵体欠安，是吗？”

“多谢委员长关心，家父身患痼疾，恐难以久留人世。”

“哦，那老先生现在何处呢？”

“在家乡河边村静养。”

“河边村？怎么走呀？”

“河边村在五台山脚下，距太原有一百多公里。”

“那我明天去探望探望他老人家。”

“这……”

阎锡山惊讶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蒋介石果然在阎锡山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五台山河边村，拜访了阎书堂。蒋介石还毕恭毕敬地站在阎老头面前，脱下衣帽，口称老伯，一连行了三个鞠躬礼。

三个月后，阎老头去世。蒋介石下令拨发治丧费 10 万元，并派参谋总长何应钦为代表到河边村致祭，又亲手书写了前头转引的那副挽联。

阎锡山是只著名的老狐狸，蒋介石越是这样恩宠他，他越是满腹狐疑。

反共是阎锡山的一贯立场，出兵陕北，只要你蒋介石愿意出钱出枪，也好说，何需你委员长不辞劳苦，亲来太原，还要对老父来这么一番表演呢？更何况蒋阎本为政敌，几年前还打过民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战争——中原大战呢！

阎锡山越想越不对劲，召来心腹，进行密议。最后认为，老蒋可能是在打派往江西剿共的那支晋军的主意。事不宜迟，赶快将那支军队调回。

1935年 7 月，那支由李生达率领的晋军从江西回到了山西。

一观察，果然令阎锡山震惊不已。

这支晋军，装备大为改善，颇有几分中央军的气派。

更令人惊讶的是，前后仅一年，这支晋军的风纪也中央军化了。训话时，一提到“蒋委员长”，全体官兵便自动立正。而提到“阎主任”(阎锡山时任太原绥靖主任),所有的人都无动于衷。

这还了得！

“立即彻底清查一下李生达与蒋介石的关系！”

很快，报告送上来了。

1928 年 10 月，时任晋军第五军军长的李生达与傅作义在天津迎接蒋介石前往北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会谈。蒋介石对李生达一见如故，慰勉有加。此后，李生达便通过同乡苗培成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

1931 年冬，李生达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中全会，受到蒋介石的单独会见，并接受了蒋的一笔巨额赠款。此后，蒋李之间建立秘密电台，互通情报。

在江西期间，蒋介石不但给李生达部更换装备，而且许诺他出任山西省主席，国民党中央委员。

……

“好一个老蒋，我阎某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我就同你斗斗法，如何！”

1936 年 5 月，李生达进一步高升，出任“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并代行总指挥职权。这是个什么职务呢？我们只要知道总指挥是此时的参谋总长陈诚，就知道这个职务的含义了。

就在李生达踌躇满志，准备过河去就职时，他的卫士熊希月掏出手枪，二话不说，连发数弹，击毙了李生达。熊希月刚刚收好枪，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又将他击毙了。

李生达不明不白地死了。开吊之日，灵堂又忽然起火，李的两个儿子又葬身火海之中。

蒋介石当然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又能说什么呢？只好“惋惜”一番，“褒奖”一番了事。

军队，地盘是阎锡山的命根子，给他老爹鞠几个躬，夸几句“元老”“神仙”又有什么用呢！

2. 毛泽东函阎锡山：“同属国人，胜之不武”

毛泽东也看中了阎锡山。

毛泽东没有钱，没有枪，不能封官许愿，不能给阎锡山地盘，又怎么能同一贯反共的阎锡山拉上关系呢？

毛泽东看中了一点：日本人必定会来抢阎锡山的地盘。

山西是华北的屋脊，要控制华北，必定控制山西。

山西是煤铁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煤炭同今日的石油一样，是现代战争的“血液”，钢铁更是现代战争的“脊梁”，日本要掠夺中国的资源，必定侵占山西。

问题是要如何帮助阎锡山认识到这一点，又要如何才能使阎锡山认识到：要抗日就必须联共。

阎锡山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实力派当然最相信实力。

要拉他，看来还得先打一打他。而且陕北地瘠民穷，人烟稀少，一下增加这么多红军，也很难负担得起。山西虽不富，比陕北还是强多了。为了抗日大计，先向阎锡山“借”一点粮和枪，也未尝不可。何况，红军要抗日，也必定进入山西。

1936 年 2 月，红一方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

当时，红二，四方面军还没到达陕北，整个陕北红军仅 13000 多人，除留下一支部队由周恩来、博古率领防守陕北外，抗日先锋军也就是 1 万人左右。

2 月 20 日，抗日先锋军在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开始过河东征。21 日下午，东征军便全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阎锡山有 10 几万军队，有经营 20 多年的堡垒，还有优势的火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又是土生土长的部队，熟悉那些复杂的山岳地带地形。因此，阎锡山最初以为红军没什么了不起，不急不忙地部署了一个“口袋阵”，试图把红军引入腹地，在地势险恶的山岳地带聚歼红军。下属提出异议，认为应当利用黄河天险堵住红军，阎锡山满有把握地说：

“咱们有优势的火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在山岳地带作战更是相得益彰，而红军缺乏此种武器，咱们对他作战可稳操胜券。”

这时的阎锡山，对红军真是知之太少。红军就是从大山中打出来的，“在山岳地带作战”，晋绥军凭那些太原造的山炮和手榴弹是红军的对手吗？

很快，阎锡山就发现自己错了。红军的足迹一下就遍及山西 20 多个县，其中一部还打到了距太原仅 50 里的晋祠一带。

阎锡山只得向中央军求援，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事，约 10 个师的中央军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山西。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决战，5 月 5 日，红军结束东征，全部退回陕北。

75 天的东征，红军在山西新增了 8000 兵员，筹得 30 万元军款，缴了 4000 多支枪，20 门炮，取得了到达陕北后继直罗镇一战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彭德怀语)。

红军东征使晋军损失了 7 个团，还使中央军进入山西，增加了阎锡山对红军的仇恨。但也使阎锡山认识到了红军的力量，为他日后接受联共抗日的政策打下了基础。

首先前来劝告阎锡山联共的是张学良。

1936 年 4 月 29 日，张学良自己驾驶飞机，从西安飞到太原。

那时，正是太原局势紧张的时候。绥靖公署大门周围堆满了麻袋构筑的掩体，办公大楼戒备森严，灯火日夜不息。阎锡山愁

绪万千，饭菜不思，举止失常，逢人便骂。

“百老,战况如何?”

阎锡山与张学良的父亲同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都督（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曾联过手，也曾交过战。不管是敌是友，在张学良面前，阎锡山仍是元老、长辈，他背后还称张为“小六子”。

“学良，别提了，红军的确厉害。”

“再同红军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呀!”

“不打下去又怎么办呢?”

“红军不是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吗?”

“谁知这种话是真是假。”

“我看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现在在东北坚持抗日的，主要就是共产党，我们东北军真是愧对国人呀!”

“这倒是事实，但红军愿意在山西停战吗?”

“不瞒前辈，我们东北军已经同红军暗中议和了，今天晚辈前来，就是将此情相告，并想请前辈与学良，虎城联手，共同劝蒋抗日。”

“嗯?”

接着，张学良详细介绍了在4月初与周恩来在延安会面的情况和东北军如何与红军停战议和的情况。

阎锡山同意考虑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劝蒋抗日及与红军停战议和，一致对外之事。

接着，共产党的代表朱蕴山也以“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来到太原，约请阎锡山加入大同盟。阎锡山闪烁其词，不置可否。

同阎锡山联络，还有一个很方便的条件。

阎锡山的头号亲信，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有个儿子，叫赵宗复，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个重大的关系，当然不能轻易暴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但由他来了解阎锡山集团的内幕，真是太方便不过了。

根据各方情况分析，中共中央认为，有可能同阎锡山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

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于 1936 年 5 月 25 日书信一封，托东征时俘虏的晋军 392 团团长郭登瀛送给阎锡山。

毛泽东致阎锡山的信是这样写的：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典出汉刘向《说苑》意为一个楚人失去的东西为另一个楚人得到，内部虽有得失，但并没有落入外人之手——作者注),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国难日亟 ，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当时,中央军约 10 个师进驻山西，并在暗中策划河东道独立，脱离阎锡山，蒋介石又在河西陕甘苏区附近集结 154 个团约 25 万人的兵力围攻红军，并阻止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所以，红军此时不能不坚持反蒋，并利用蒋阎矛盾来说服阎锡山联

共抗日。

除致函阎锡山外，毛泽东还写了二封亲笔信给阎的部属，其中一封给赵戴文，一封给杨效欧和李生达，希望能从阎内部逼阎抗日。

对毛泽东的来信，阎锡山公开没做什么表示，但在 6月 6 日的日记中写道：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己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

阎锡山能认识到，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继续打内战，既不义，又不智，连“常人”都不如，这表明毛泽东的信对他是有影响的。

接触仍在深化、具体化。

6月，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周小舟来太原，阎锡山态度仍不明朗。

8月，中共北方局派朱蕴山重来太原，并带来了中共中央 1936 年 8月 25 日致国民党书。这时，阎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将中共中央的公开信翻印几千份，发给部属和有关各方。还对朱表示说，推动政府抗日是可以的，建立统一战线是很好的，但公开联络红军，目前还不行。他还担心红军进入山西，只是打着抗日的招牌来占山西的地盘。因此，他不同意红军过黄河来山西的抗日，假道也不行。谁不知道历史上那个“假道伐虢”的故事呢？那个借路给晋国结果自己被先吞掉的虞国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陆县呀！

红军不能来，共产党员还是可以来。

别看阎锡山以老奸巨滑著称，他也有过光荣的历史，是 1905 年入会的老同盟会员，还是同盟会骨干组织“铁血丈夫团”的成员，对动员民众的作用，有过切身体会。并认为共产党在动员民众方面是后起之秀，很有一套办法。因此，他一听到著名共产党员薄一波在北平出狱的消息，便派自己的侄子梁化之带着他的专

电,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计。”

薄一波刚从监狱出来，对外面的局势不了解，当然不愿去为阎锡山这个著名的“土皇帝”那里办事。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得知此事后，立即明确指示：

“机会难得,要去 我上门来,还不去 不能失掉这个好机会。”

于是，薄一波于 1936 年 9 月回到太原，主持阎锡山在“九·一八”纪念日成立的，以动员各方力量共同抗日为宗旨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

更不寻常的是，阎锡山还于 1936 年 10 月允许成立“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其负责人有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

有趣的是，阎锡山本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国民党的山西省党部自 1931 年 12 月被阎锡山利用学生运动查封后，还一直没有恢复正常的活动。

“土皇帝”就是“土皇帝”。你委员长在陕西剿你的共，我阎主任在山西联我的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谁能制服谁”(阎锡山语)。

阎锡山老于世故，当然不是要同蒋介石赌气，他敢于冒险联共，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抵抗不了，怎么办？

“同共产党合作，这当然有风险。现在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有利用共产党，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

共产党已在山西打着阎锡山的招牌半公开地活动起来了，还要争取让红军进入山西才行。

针对阎锡山害怕红军抢地盘的心理。毛泽东于 1936 年 10 月

明确表示：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贸然向晋绥开进。取得同意后，红军依约进入协定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服从阎锡山统一指挥，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

阎锡山不敢贸然同意。山西驻有 10 个师的中央军，陕甘宁驻有几十万“剿共”大军，红军入晋，这么多军队一齐打来，岂不会把山西的地盘占得干干净净？

红军要过黄河，要取得阎锡山的同意，还得让蒋介石点头才行。

这时，日军已开始向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绥远逼进，晋绥军准备抵抗。为此，阎锡山决定加入张学良，杨虎城的劝蒋抗日阵营。

3.“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蒋介石“联共”有过考虑，而且比张学良、阎锡山更早。

蒋介石是从“联俄”的角度开始考虑“联共”的。

蒋介石有一个观点：单靠中国本身的力量根本抵抗不了日本的侵略。他在 1933 年 10 月 2 日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日本人“要我们哪一天死，我们就不得不在哪一天死。”

那为什么日本又不要中国在“一天”中就“死”去呢？蒋介石认为，那是因为有其它强国在牵制着它。所以，中国要抗日，就必须联合世界各强国，也就是得到他们的武器支援和其它支援。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苦苦地等待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制裁，但英美等国隔岸观火，无动于衷。这样，蒋介石就只好把目光转至苏联。

1934 年夏，蒋介石委任蒋廷黻为全权代表，去苏联“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随后又先后派了邓文仪、张冲、陈立夫去

苏联进行活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联俄”就必须“联共”。因此，邓文仪在莫斯科透露,国共问题,可以‘政治解决’。他还在 1935 年 11 月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接触。

1935 年 12 月 9 日,蒋介石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谈话中公开表示：“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

1936 年 1 月 22 日，蒋介石对鲍氏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蒋介石提出条件，共产党是能够接受的，并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如放弃“反蒋”的口号，从山西撤军，以全党的名义于 1936 年 8 月 25 日正式提出：“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等等。

但蒋介石希望“团结”的是一个软弱的共产党，而不是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他一面指定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负责同共产党联络之事，一面调集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

同阎锡山相比,张学良在‘剿共’战争中吃的亏更大。从 1935 年 9 月到 11 月，3 个月还不到，东北军在陕北“剿共”战场上损失了近 3 个师的兵力。更令张学良悲伤的是，遭到全歼的 2 个师：110 师和 109 师的编制被蒋介石趁机取消，对阵亡的该两师的师长何立中、牛元锋，张学良请求发给其家属抚恤金各 10 万元,蒋介石也批示道：“碍难照准。”

这哪里是单纯的“剿共”，岂不是一箭双雕，既“剿共”，又消灭“异己”吗？

只有傻瓜才继续干下去呢！

所以,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剿共’军虽陆续增加到 260 个团，但愿意打的三分之一也不到。而红军方面，则在 1936 年 10 月实现了三大主力胜利大会师。

蒋介石大梦难醒，仍坚持认为：“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决定“御驾”亲征，前来前线督战。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50寿辰。当局决定在蒋驻地洛阳大庆一番。

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3人先在西安密聚，进行了彻夜长谈，决定利用祝寿机会联合向蒋进谏，说服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祝寿典礼完毕后，蒋介石单独会见张、阎2人。

当时，傅作义也从绥远来到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分别向阎锡山（傅此时仍为阎的部将）和蒋介石汇报了绥远的敌情。

1936年春，伪蒙军在日军的支持下侵占察北6县，并开始向绥远渗透。

7月,伪军4000余人进犯绥东红格尔图,被傅作义部击溃。此后，日伪军秘密集结军队，准备由日军军官指挥伪军再犯红格尔图，以打开进一步西犯的通道。到10月31日蒋介石洛阳作寿时，著名的绥远抗战已做好了部署，后于11月5日打响。

张、阎按事前的约定，试探着用紧迫的局势来改变蒋坚持内战的政策。但蒋介石毫不动摇，说着说着，蒋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厉声责问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两人只好告退，分手前，阎锡山无奈地说：“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吧。”

随后，张、阎2人分别按自己的方式做了起来。

阎锡山的方式是公开宣布“守土抗战工，号召’晋绥军全体在平绥线上与敌一拼。”并组织了以傅作义，王靖国两部为主力的绥远抗战。最后于11月24日收复百灵庙,击毙日军30万,处死日本“指导官”29人,其中大佐1人,击毙伪军1000余人,俘敌40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